

八一起义缘何选择南昌

■徐佳佳

记史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八一起义是在革命低潮时爆发的。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来自“盟友”的背叛和屠杀。妥协还是反抗?在生死考验面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对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的大无畏品格。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八一起义为什么会在南昌爆发?这其中经历了哪些决策过程?

南下战略

八一起义会在南昌爆发,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武装起义,并南下广东,再次建立革命政权的总决策有重大关系。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国共产党内部就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1927年,北伐正如如火如荼地进行,蒋介石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公开决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革命果实如何巩固,中国共产党内部莫衷一是。参加南昌起义的李嘉仲回忆,“对于革命武装应当向什么地方发展,中国共产党内有三种思想倾向”。

第一种主张是东征攻打南京,与蒋介石拼个胜负。1927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武汉共和里14号召开军事干部会议时,瞿秋白就提出该主张,“宁汉合流已成定局,中国大革命已告一段落”,因此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撤出汉口,沿长江流域东进,打到南京去”。

第二种主张是西退四川,依靠当地的军队,再做打算。当时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副军长黄慕颜等就持这种观点。但更多人倾向于南下广东,稳住已有的革命根据地,重整旗鼓,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发动北伐。由于北伐前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展了较多的农民运动,革命基础较好,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根据地建设又比较顺利,再加上当时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许多士兵是广东籍,因此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十分支持,并坚信“只要我们开到广东,就一定有很好的发展”。

众说纷纭中,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往何处去?1927年7月初,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武汉约见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和李嘉仲等人,对形势做了详细分析。周恩来在会上反驳了西退四川的观点,认为当时四川地区的农民运动尚未大规模开展,革命基础较薄弱,退守四川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相反,湘鄂赣粤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形势十分有利,因此他坚持革命的中心应在南方。

周恩来的观点与不久后中共中央南下的决策是一致的。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后,一扫之前妥协退让的政策,正式明确了今后的战略方向,“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赣粤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集合我们的武力,依靠发动回粤徐图发展”。

不过,这一决策并没有明确在江西发动起义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八一起义会在南昌爆发,并在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其中还蕴含了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与当时革命形势下的一些机动决策有关。



八一起义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

徐佳佳摄

革命力量汇聚

八一起义在南昌爆发,最直接和偶然的因素就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武装力量在南昌、九江一带快速聚集,且当时张发奎等人对叶、贺部队不断施压,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面临“不暴动我们的军队(就要)被解散”的紧急情况。为此,八一起义才在秋收起义等中共预先策划的武装暴动之前,于1927年8月1日爆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反共,虽然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立刻响应蒋介石的主张,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共的声音和行动,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处境十分危险,因此在武汉就地发动起义是很难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作出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并借此南下的决策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纷纷离开武汉,其中不少人从水路向九江转移。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向九江转移,一方面九江距离武汉近,水路交通便利,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江西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在江西长期主政、后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中国共产党人持包容态度,并曾经公开反蒋。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经过蒋介石的多次拉拢,朱培德才于5月27日宣布查封共产党员主办的《三民日报》,并决定将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相对于当时湖南、浙江、上海等地反革命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肆屠杀,江西的环境是有利于革命的。因此,在叶挺、贺龙部队到达九江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九江待命了。

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等人赴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军事部派袁崇霖、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前往九江,到部队开展工作,为起义做好准备。在充分考察当地情况后,大家认为近期可以在南昌、九江一带发动起义。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在九江、南昌一带发动起义,还有一个重要契机,那就是叶、贺部队能够借“东征讨蒋”之名迅速在九江、南昌一带集结。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坚持先北伐再东征讨伐蒋介石的计划。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行动增多,1927年6月底,武汉方面开始了东征的准备。

最初,武汉国民政府以唐生智和张发奎部为东征军主力。已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的叶挺率部作为先遣队从湖北武昌沿长江到达九江后,贺龙部队也很快到来。当时,由于唐、张二人与汪精卫的分歧,东征讨蒋一直没有实质

性进展。直到7月中旬,汪精卫才重新令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贺龙各部共同组成东征军向南京进发。南昌起义前,贺龙虽然不是党员,但在立场上一直与中国共产党靠近。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军部设在九江饭店。谭平山曾试探性地将中国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情况透露给贺龙,“贺表示甚为热烈”。

此外,被武汉国民政府派往江西抚州的朱德,于7月21日秘密返回南昌。他领导下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等确定能够参加起义。就这样,在起义前,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主力部队很快集结于九江与南昌两地,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最终确定起义地点

起义部队在九江集结,但是起义地点却选定在南昌,这一决策与两个城市的交通和地理环境等因素有着重大关系。

由于当时革命环境瞬息万变,中共中央一致认为必须在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尽快举行起义,向全中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革命的决心。

为力保起义能短时间内举行,中共中央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九江负责此次起义。周恩来赴九江前,中共中央指派任务时只提出“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昌起义”,故到底在南昌还是九江发动起义悬而未决。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赴九江对起义的时间、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前期抵津的李立三等人进行协商。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认为短期内举行武装斗争非常必要,但具体的起义地点是在九江还是南昌,则需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

九江,濒临长江,交通发达,是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国门后,九江就成为长江沿岸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据点。九江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帝斗争,群众基础很好。但是九江水域大,腹地不大,假如在此起义,部队回旋空间小,撤退会成为难题。

同时,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时,帝国主义感到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各国舰艇聚集到长江沿岸,扬言将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因此,如果在九江起义,那么帝国主义势力将很快通过水路扑向九江的起义部队。

另外,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力量也在长江沿岸集结。下游是蒋介石部队,中上游是汪精卫部队,这两股力量虽呈对峙态势,但在反共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因此处于南京与武汉中间的九江如果爆发起义,他们极有可能会调转枪口,通过水路共同向新生的革命军队开枪。这也是在九江起义的隐患之一。

相反,南昌与九江只相隔100多公里,叶、贺部队快速从九江到南昌集结并发动起义是可行的。而且,南昌地处内陆,腹地辽阔,部队机动范围大,起义后有较多回旋余地。同时,当时南昌只有一条

南浔铁路与九江相连,只要起义部队能够控制住该铁路,就可以从铁路交通上阻挡大批前来增援的反革命武装,减少南昌城内的起义压力。同时,南昌还有护城河赣江作为天然屏障,且当时的赣江水深不测,通航能力有限,反动武装短时间内通过水路调兵到南昌的可能性较小。这些交通、地理优势让南昌易守难攻。

此外,南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大革命时期,南昌的《红灯》等报刊刊登了大量声讨蒋介石的文章。1927年3月6日至17日,蒋介石在抚州、永丰、南昌、九江等地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大量革命志士后,南昌各群众团体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声讨活动。4月2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下,省农民协会发动南昌新建县农民,与南昌各界民众数千人在钟铎新舞台举行示威大会,控诉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反革命罪行。随之,聚会在南昌军官教育团的支持下,捣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江西省政府,并拿下了南昌国民党党部。

另外,南昌还具有一个九江当时不具备的时机优势,那就是当时南昌守城兵力较为空虚,总兵力约6000人。当时,朱培德为布防,将第五方面军第3军调至樟树、吉安、吉安等地,第9军调至进贤、临川等地;第二方面军余部退到九江地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共2万多人。这些力量与南昌守城兵力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是起义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通过对交通、地理位置、敌我力量等方面的对比,在南昌与九江之间,中国共产党很快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并命令叶、贺部队于7月28日以前集中于南昌。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从1927年7月初中共中央改组后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到8月1日在南昌举行起义,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不过1个月。南昌被选为八一起义的地点,是当时中共中央结合整体战略意图与具体革命形势做出的正确抉择。



长征 第5249期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渡海登岛出奇兵

「渡海先锋营」战旗

■易大寨 马占

1949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军队兵锋直指华南,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当局于12月设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辖陆海空军十万余人,及相当数量的舰艇、战机,企图以所谓“立体防御”死守据守,把海南岛当作反攻大陆的基地。

1950年2月1日上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出席第15兵团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第15兵团、第40军、第43军及琼崖纵队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敌我态势,讨论了渡海器材问题,制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强行登陆相结合”的登陆作战方针,即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而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登陆的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力求全歼国民党军。

因此,总攻发起前的小规模偷渡就成为决定渡海作战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第43军第128师第383团第1营(配属九二步炮连),被选为第43军的首支偷渡部队。

1950年3月10日,雷州半岛东南海面为阴雨天气,敌机不便起飞和侦察,有利于我军隐蔽航行。当日13时,第1营1000余名官兵,在团长徐芳春、营长孙有礼、教导员王恩荣率领下,乘船21只,自雷州半岛以东之瀛洲岛起渡,向海南岛海口东南预定登陆地段——赤水港航行前进。

部队出发后,最初未遇到任何敌海空军的袭扰。然而,至黄昏时分,海面突然狂风大作,波翻浪涌。第1营两只船被巨浪打翻,6艘帆船的桅杆被狂风吹断,整个船队在滔天巨浪中被打散了。指挥船上的马灯点不着,旗语看不见,电台也无法架设。

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各船将士以血肉之躯同大海展开搏斗。一些船舱被海浪击穿,战士们拿着棉被堵住漏洞,用身体压住棉被,但海水仍然不断涌入,战士们就用瓢、盆、茶缸不断舀水……第128师官兵大多是北方人,在风浪中,不少战士开始晕船,先是吐饭,然后吐酸水,最后甚至吐血。

但是,这些困难都未能阻止该营前进。经过20个小时的艰难航行,除两艘船百余人在风浪中失去联络外,其余部队均抵达海口文昌东北的赤水港、铜鼓岭一带。在琼崖纵队一部的协同下,全营指战员以勇猛行动击溃滩头之敌,突破敌守军1个团的封锁,并歼敌一部,成功进入琼东根据地,成为接应主力部队登岛的一支重要力量。

3月13日,第43军党委决定授予第128师第383团第1营“渡海先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

猛打猛攻 首冲敌阵

■崔竞 蒲元

平型关,古名瓶形寨,位于山西省灵丘县白崖乡境内,系内长城重要关口之一,扼守晋冀两省之间重要通道——蔚代公路。

1937年9月中旬,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并南下逼进雁门关;其另一路华北方面军第5师,则由河北宣化、蔚县进犯晋东北,企图突破平型关要隘,与西线日军合击雁门关,并继而夺取太原,进占全晋。

9月22日起,日军向平型关地区猛攻而来。八路军总部命第115师迅速挺进至平型关附近。23日,第115师召开干部会议,进行作战部署和战斗动员。24日夜,师主力冒雨赶至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和发扬火力的平型关东北公路右侧山侧设伏。25日拂晓,日军第5师第21旅一部携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由于道路狭窄,雨后路面泥泞,日军车行缓慢,队伍拥挤。第115师抓住战机,果断开火,平型关战役由此打响。

谷道中的日军突遭打击,行军纵队一时陷入混乱。趁此机会,埋伏在最前沿、负责截击敌先头部队的第343旅第685团第2营第5连冲入敌阵。敌军一面利用车辆、辎重进行掩护,凭借优势火力进行顽抗;一面试图抢占附近的1363高地和老爷庙高地。1363高地在敌我伏击线的顶端,是第115师封锁谷道的最后一道屏障。

见此情形,第5连指导员杨俊生带领突击排迅速向高地冲去,连长曾宪生则率另外两个排从西翼进行包抄,先敌一步抢占了1363高地的第5连官兵拼死抗击。弹药告罄后,战士们便以白刃接敌,连续

打退多次进攻。激烈的肉搏战中,连长曾宪生刺死10余名日军。当看到又有日军逼近,已浑身是伤的曾宪生毅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指导员杨俊生身负重伤,仍浴血指挥战斗。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顶上……整个战斗,该连毙伤敌百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

9月25日13时,平型关战役结束。我军以劣势装备歼敌1000余人,并缴获大量装备物资。平型关大捷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战后,为表彰第685团第2营第5连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突出战绩,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光荣称号。

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该连先后荣获“军政双胜连”“守如泰山,攻如猛虎”“平汉战役主攻连”“渡江英雄连”等殊荣。抗美援朝战争中,该连涌现出一等功臣、朝鲜“国旗勋章”获得者李国海等英雄人物。和平建设时期,连队先后参与唐山抗震救灾、大兴安岭扑火救灾等重大任务,先后荣立一等功8次,二等功7次,三等功19次。

